



来自以色列的 间谍

本·丹 著
司 仁 译

群众出版社

165
F303
201

来自以色列的间谍

本·丹 著

司 仁 译

边 中 校

(内部发行)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1018 5. 1010

来自以色列的间谍

本·丹 著 司仁 译 边中 校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6.625印张 139千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192 定价：0.65元

(内部发行)

內 容 提 要

伊利·科恩是以色列的著名间谍。1962年，他以一个从南美洲来的阿拉伯大亨的身分来到了叙利亚“经商”。在叙利亚他广泛结识军政要员，出入于政府首脑机关，窃取了大量绝密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为以色列在中东战争中赢得了时间。1965年叙利亚反间谍机关在“苏联技术专家”的协助下，测出了科恩使用的收发报机的方位，伊利·科恩被当场抓获。

伊利·科恩被叙利亚当局宣布判以死刑后，以色列在世界许多国家掀起了一场“拯救科恩生命”的运动。不少国家的首脑和知名人士，包括罗马天主教皇、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和前总理埃德加·富尔等都向叙利亚当局发出“对科恩免于死刑”的呼吁，但均遭到了大马士革的拒绝。1965年5月这个来自以色列的间谍被当众绞死在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上。

这是一本纪实性作品。作者通过对伊利·科恩一生的追述，介绍了以色列秘密情报局的组织机构，招募、培训间谍的原则和方法以及活动特点等，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以色列及中东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内幕。由于作者的立场，书中极力吹捧伊利·科恩的所谓“英雄业绩”及为之奋斗的事业，希读者注意鉴别。

目 录

一 最后一夜·····	1
二 在埃及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7
三 在开罗的阴谋破坏活动·····	13
四 适应于以色列·····	23
五 以色列秘密情报局·····	27
六 学做间谍·····	37
七 新身分·····	49
八 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旅客·····	59
九 在以色列的间歇·····	79
十 去大马士革途中·····	90
十一 “88”·····	100
十二 努凯卜·····	110
十三 失踪的下士·····	124
十四 进一步的情况汇报·····	138
十五 盛宴密谋·····	145
十六 一名纳粹战犯·····	158
十七 女歌星·····	162
十八 激烈的争论·····	170
十九 诀别家园·····	175
二十 被捕·····	183
二十一 出类拔萃·····	195

一 最后一夜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九日星期二凌晨三时半，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主要广场——烈士广场，公开绞死了一个名叫伊利·科恩的以色列间谍。大马士革电台在午夜前，第一次广播了要将这名间谍处以绞刑的消息。

时近午夜，监狱看守急促的脚步声在过道上回响，监禁伊利·科恩的单人牢房的门被打开了，科恩从睡梦中突然惊醒。他惊恐地从行军床上坐起来，但仍然睡意朦胧。在彻夜不熄的微弱灯光下，他看见两个叙利亚士兵的身影，心中揣测道：难道又要去经受一场酷刑……

当他完全清醒过来时，他才注意到那个审问过他的特别军事法庭庭长戴利上校和那位大马士革的八十岁的犹太法学博士尼西姆·安达博站在两个士兵的中间。他们意外的光临使他预感到自己面临的命运，但他已没有多少考虑的时间了。

上校权重势赫，高傲自大，说起话来尖声尖气。他命令伊利穿衣、立正。

这是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一的午夜，伊利·科恩在马扎监狱警卫森严的单人牢房里立正站着，静听戴利上校宣布决定他命运的判决词：

“今晚你将被处以绞刑。”

上校用阿拉伯语讲毕，就退后一步，给博士让路。博士是位白胡须老人，弓着背，怀着悲痛的心情，用颤抖的声音念着希伯来文的祈祷文：“慈悲的真主……”这个祈祷文是专为一个将要去世的人背诵的。

伊利·科恩跟着博士小声地祈祷着。这位老人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当安达博博士不能自持，把一部分祈祷文背错的时候，伊利轻声有礼貌地给他纠正。

罪犯、博士和用斯登式冲锋枪武装起来的四名叙利亚士兵坐在一辆大篷货车里，在军人的护送下，出了监狱大门。夜里的空气温暖、湿润，这时已近凌晨两点。他们穿越沉睡的城市，伊利看不见车子开往何处，但是他知道自己要被带上几百年前建成的大马士革绞刑台。大马士革人给这个地方起了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名称：屠宰场。这是被判处绞刑的罪犯最后停步的地方。

囚车在烈士广场一角的警察局门前停了下来。伊利被带进了警察局，在一张粗糙的木桌旁坐下。戴利上校告诉他，如果愿意，他可以留个遗嘱或写封诀别信。囚犯转向正在向上帝唱着单调重复的赞美诗的博士，平静地说：“我没有罪过，不欠任何人东西，我不需要留遗嘱。但是我要对我的家庭尽最后的义务，我要给他们写封信。”

他们给了他一支钢笔和一张纸，他不慌不忙、镇定自若、字斟句酌地写起来：

“我的妻纳迪亚和亲爱的家人们：

这是我写给你们的最后的话，我请求你们生活在一起。纳迪亚，请你宽恕我，你要保重自己和照料好孩子，要设法使

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你自己要多加保重，照看好孩子们，不要让他们缺少什么，和家里人要永远和睦相处。

同时，我希望你能再婚，好让孩子们有个爸爸。你完全有这样的自由。我求你别沉湎于不复返的往事中，不要悲伤。要永远向前看。

我吻别你了，并请代我向索菲、艾里斯、肖尔和家里所有的人物别，别忘了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告诉他们，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思念着他们。

你们不要忘了为拯救我父亲的亡灵，为解救我的灵魂，作祈祷！

吻别了……祝一切安好！

伊利·科恩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

他用阿拉伯文写完这封信后，就把信纸推开，然后踌躇了片刻，又把它拿了过来。他用另一张纸抄写了这封诀别信，这次用的是法文。他没有被允许用希伯来文写。他要把用法文写的这封遗书，留给他的妻子和家庭，使他的遗言不仅只是用阿拉伯文留存下来。戴利上校把这两封信放入袋子，暗示他该走了。

警察局离灯光耀眼、戒备森严的广场不远。绞刑架设在烈士广场的中心，用铁丝网围着。这个广场从建立之日起，就记载着叙利亚共和国历史上的恐怖和光荣的篇章：无数次当众处死犯人；无数次对搞政变获得成功的英雄们的欢呼。

三年前，伊利·科恩曾夹杂在大马士革的人群中，在这个广场上散步，观看叙利亚部队在俯瞰加利利海的努凯卜高

地战斗中缴获的以色列半履带式装甲车辆。而现在，却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半夜起床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个地方，紧张而静静地等候着——观看活的而后是死的科恩。他在三个月前就被叙利亚报界加上“间谍大王”、“史无前例的罪犯”、“披着人皮的真正魔鬼”等辱称。对于几百万叙利亚公民来说，这个“以色列间谍”已成了一个具有神奇力量的非凡人物。几年来，难道不就是他曾设法蒙骗了发动政变后上台的强有力的叙利亚军政府，并且足智多谋地战胜过叙利亚秘密情报局这一庞杂的机构吗？

事实上，从一九六二年一月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在大马士革已经成为一位国家要人。此后，叙利亚情报官员才闯入他的公寓把他逮捕起来。从此他就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单独囚禁了一百天：既没有来访者，也见不到律师和信件。对他的审讯，虽然部分实况已用录像机拍摄下来，但由于都是关起门来进行的，因此，对于外界是否有人知道他已被逮捕一事，他也不得而知。

在即将被处死的时刻，他当然没有察觉到叙利亚政府的紧张不安。执行的日期仅仅是在四十八小时前确定的，而且只有军政府中少数上层官员才预先得知此事。叙利亚总统阿明·哈菲兹上将命令党政军首领在大马士革待命。秘密报告中建议：对这个间谍执行死刑的判决不要履行通过手续，以免激起一场来自以色列的进攻。在莫斯科出差的叙利亚军事情报部的首脑阿梅德·斯韦代尼中校接到通知，在二十四小时内返回大马士革。叙以边境的叙方一侧，从南部的依尔哈马到北部面向达恩村的小山丘，当晚增加了摩托车、大炮和迫击炮等武器和增援部队。在边境那边，执勤的以色列士兵

用望远镜从敌方的探照灯的光束中窥测到它所派出的实力强大的军队推进到山丘哨位的情况。

伊利·科恩对这些紧急防备措施一无所知，他走上绞刑台，拒绝了戴利上校伸手扶他的表示。紧靠绞刑架的目击者们——一群由大约五十人组成的新闻记者、摄影记者和叙利亚电视台的技术人员，看到大马士革的巨人般的刽子手阿比·萨利姆没有解开囚犯反绑着的两手就给他披上一件粗糙的白色死囚衣服。科恩的脸色是苍白的，但显得很平静。

在那里，审判过伊利·科恩的军事法庭的所有成员，都在听戴利上校对这个间谍的问话：“伊利·科恩，你在叙利亚有同谋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而这些问题也正是他被捕以来，一直使叙利亚领导人深感烦恼的。

然后，这批旁观者听到囚犯又一次重复了经过几个星期的严刑才从他口里挤出来的仅有的供词：“我悔恨我做的每一件事，我维持我原来的声明。”（一小时后，戴利上校对报界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说明：科恩的意思是说，他在叙利亚没有同谋。）

科恩作了陈述后转身离开戴利上校，走上绞刑架的阶梯。他拒绝让刽子手给他的眼睛蒙上罩布。博士作最后一次祈祷：“慈悲的真主……”四分钟以后，刽子手报告军事法庭的人员，伊利·科恩死了。

然后，戴利上校在死者白色死囚衣上贴上一大块布告，这是叙利亚处死犯人的最后一道程序。布告上用阿拉伯文手抄体写着军事法庭的判决，内容如下：

“以叙利亚阿拉伯人民的名义判处伊利亚赫·本-肖

尔·科恩死刑。该犯犯有潜入军事部门，盗窃军事情报传送给敌人的罪行。”

这样，伊利·科恩就结束了他那扑朔迷离的一生，他在自己的国家和敌对的国家里都给人们留下了传奇般的形象。清晨，在当局把尸体运走之前，十万人列队走过他的身旁。他的尸体被埋葬在大马士革犹太人的墓地上，坟墓至今仍然保留着。虽然以色列政府曾多次申请把他的遗体归还给他在以色列的家属，但都遭到了叙利亚政府的断然拒绝。

二 在埃及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伊利·科恩出生在埃及，在那里一直生活到三十二岁。在那儿的最后几年里，他离开了他的家庭，去专心致志地从事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的事业——帮助埃及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科恩的祖籍是叙利亚。他的祖辈都居住在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几百年来，在那个城镇内已形成了一个兴旺的犹太人团体。早在本世纪初，科恩家族的一部分成员就离开了叙利亚，沿着当时仍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巴勒斯坦边缘地带来到了埃及，在亚历山大定居下来，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伊利就出生在那里。

象大多数东方犹太人家庭一样，伊利的父母为自己的子孙人丁兴旺而感到自豪。他们的大多数孩子都出生在亚历山大。最大的是个女孩，名叫奥德特，老二就是他们的大儿子和全家的骄子伊利，这个名字是根据先知伊利亚而取的——希伯来文叫伊利亚赫。伊利的下面还有六个孩子：莫里斯、埃兹拉、萨拉、西翁、伊弗雷姆和最小的艾伯特·亚伯拉罕。

母亲和父亲（父亲是一个很有自尊心的东方犹太人，喜爱戴那传统的圆形无边红毡帽^①）老是整晚上地用他们叙利

^① 地中海东岸各国男人戴的。——译注

亚老家的土话追述着阿勒颇的情景。六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却长得酷似埃及犹太人。科恩一家人做梦也想不到在一九六二年的一天，他们的大儿子会作为一个以色列的间谍返回故乡阿勒颇，对叙利亚军官颠覆政权的活动进行严密的监视。

伊利·科恩是一个身材硕长、头发乌黑的孩子，他被送到亚历山大犹太团体创办的迈穆尼德斯学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上希伯来文课，从《圣经》中学习这种语言。他聪敏过人，是个少见的优秀学生。经过良好的基础教育，他升入了法学博士文丢拉办的高等希伯来语研究学院。

这时，亚历山大的犹太团体和他们的阿拉伯邻人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对于占少数的犹太人却没有产生象在西方类似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那种影响。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不但没有被占压倒多数的穆斯林教徒同化，反而竭力保持他们自己的传统，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把它传给子孙后代。这样，科恩家的所有孩子，从伊利开始，自幼年起就进犹太人创办的公共学校，继承犹太教，研究犹太教的《圣经》和圣书，阅读和译注书面的和口头流传下来的犹太教义，保持犹太人日常的礼仪和习惯，以时钟那样的精确度来遵循正统犹太人生活的法规——所有这一切，在亚历山大，都父子相传。

伊利·科恩很快就升为高年级学生，但是他不满足于仅仅成为一个正统的犹太学者。他用大量时间来研究阿拉伯的语言和文学，同时还学讲优美的法语。他使用这种语言的流利程度不亚于使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

他的同学说他跟其他的男孩迥然不同。他很难得参加课间休息时进行的足球比赛，通常是躲到一个角落里，拿出随

身带着的书，读上一页或温习一课。那时，他唯一的体育活动就是去海滨游泳和沿着沙滩跑步。

伊利刚满十八岁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经烧到埃及边境，隆美尔的部队于一九四二年逼近了亚历山大，意大利的轰炸机经常飞越这个城市，轰炸港口——这是协约国在地中海的主要海军基地之一。

亚历山大的犹太团体和阿拉伯居民对形势的看法截然不同。阿拉伯居民中的大多数人准备伸开双臂欢迎隆美尔的部队，而犹太人却充满着德国人的来临就是犹太人的末日的预感。

科恩的同班同学戴维·克劳多（现在是特拉维夫的一个经济顾问）回忆说，当时年轻的伊利对频繁的空袭警报是满不在乎的。他把警报当作儿戏，有时甚至不耐烦和同窗好友一起参加学校的空袭隐蔽。十八岁的科恩已经以沉着冷静而著称，他从来不怕冒险。戴维·克劳多对伊利在紧急时刻用开玩笑来消除惊恐不安的同班同学的紧张情绪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但是这个勤奋而又沉默的男孩身上有某些东西使他和伙伴们不能亲密无间地相处。他对任何一个学习困难的同学，总是不假思索地给予帮助。在考试时，遇有那些使天资较低的同学感到惶惑不解的问题，他总是不顾校规将答案传递给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却一致认为他不太合群，很少参加周围的活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的同学仍旧把他作为“一个古怪的家伙”来描述。

关于他的沉默自持，可以作出一种比较简单的解释。他勤奋而又有几分孤僻，这是因为他的经济地位和别人不同。

他父亲在亚历山大开着一间小小的领带商店，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他一家八个孩子的生活，所以伊利，作为最大的儿子，不得不从小就帮点忙。他利用课余时间到一个堂兄所开的服装行里工作，以挣得自己的学费。他没有钱去看电影，也不象他的朋友那样能到学校院内的犹太人摊贩那里去买热嫩肉来当午餐。

然而，就在这个时期，他却有了一种业余爱好，这个爱好后来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而当他被派到叙利亚的时候，这种爱好又成了十分有用的本领。一九三七年，这个十三岁的孩子施坚信礼^①的时候，别人送他一部小型的柯达照相机。这可迷住了他，他不论到哪里，总是随身带着它，而且总是用它拍快照，特别是在他最小的弟弟艾伯特·亚伯拉罕出生以后拍得更多。一本影集里贴满了这个娃娃和科恩家其余人的照片，这是现今他家保留下来的最珍贵的纪念物之一。

学童们辨认汽车构造和机件的游戏，是帮助他增强观察能力的另一种娱乐活动。他往往花费好长时间，在自己家的阳台上注视行驶的汽车，学习怎样识别美国和欧洲的车型。年轻人当时对这些新型汽车十分羡慕。在亚历山大混乱的战争时期，他很快学会了区别英国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和德国梅赛施米特战斗机。他把战斗机的照片钉在自己的床上。二十年以后，他把叙利亚空军获得的苏联米格飞机的第一批图片提供给了以色列军事情报机关。

他在学校和同学们一起爱玩的另一种游戏使他的记忆力得到了锻炼。这种游戏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看一件东西，然

^① 小孩在襁褓时受洗礼，及长大了解教义时，付以坚振圣事。——译注

后把它遮盖起来，根据记忆将它尽可能详细地描述出来。这是与犹太学校的教育制度有关联的一种游戏，借以培养记忆力，因为那儿的学生们不得不把《圣经》的全部章节背下来，并且还得背诵一长串的祈祷文。

他在法学博士文丢拉办的学校里进修几年后，成为犹太法学博士学位的主要候选人。文丢拉博士每次由于各种原因离开学校时，总是由伊利来代替他的工作。博士曾对他的双亲说，“他有天才，”并竭力主张送他进罗得岛的法学博士神学院深造。

后来，以色列秘密情报局的人颇具讽刺意味地说了一句幽默的话：“一个法学博士决不可能变成一个间谍；但是一个间谍，如果需要的话，装作一个法学博士，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伊利没有成为一个法学博士。他一方面没有放弃对犹太学问的研究，另一方面又发展了对数学和物理的兴趣，力求成为一名工程师。他离开法学博士文丢拉办的高等希伯来语研究学院后，便顺利地通过了亚历山大法鲁克一世大学的入学考试，专修应用电力学。

在战争后期，世界和埃及形势的发展引起了伊利的注意。他阅读当地报刊的报道，听到人们对埃及政局的议论，对在同学们面前经常激烈地抨击年轻国王法鲁克的奢侈享乐的腐朽生活。

由于家庭环境和所受教育的影响，伊利对生活在埃及的犹太人以及在当时由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理所当然地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象亚历山大的其他犹太人一样，他很快了解到犹太秘密抵抗组织或恐怖组织的存在，如：“哈

加纳”①、“伊尔贡”②和“斯特恩帮”③。这些秘密组织进行反英活动的消息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中间悄悄地流传着，他们的英勇事迹经常详细地刊登在埃及的报刊上。此外，这些组织和许多国家保持着联系，埃及就是其中之一。亚历山大的犹太团体掩护不少来自巴勒斯坦的秘密人员。

第一次给伊利留下难忘印象的是一九四四年在巴勒斯坦发生的犹太人的斗争。“斯特恩帮”的两名年轻的巴勒斯坦人员——伊利亚赫·本·朱里和伊利亚赫·哈金，为了使世界各国对英国政府拒不允许犹太人大规模移居巴勒斯坦的事件引起注意，在开罗暗杀了莫因勋爵。伊利·科恩注意着对这两个年轻的恐怖分子的审判，对他们拒绝透露自己同志姓名的那种刚毅精神钦佩不已。

这两个伊利亚赫，现在已作为显赫一时的传奇人物载入了以色列的史册。他们俩被绞死时的年龄，与伊利当时的年龄相同，他们的第一个名字也相同。后来，伊利走上跟他们一样的奋斗道路，落得同样的结局，是不足为奇的。

① 犹太自卫军。——译注

② 犹太地下军。——译注

③ 从“伊尔贡”中分离出来的行动小组。——译注